【区域战略研究】

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实施成效及战略叠加效应优化研究*

金凤君 冯瑜满 叶志聪

摘 要：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是“十五五”时期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梳理了上述四系战略的演进过程，在理论层面解析了战略叠加效应的内在机理，构建了战略叠加促进区域发展的分析框架。之后，通过评估区域战略体系实施的区域发展成效，探讨了战略叠加的优化路径。研究认为，上述各系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国土开发格局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提升、区域差距阶段性收敛、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空间冲突缓解和跨区域联系增强，形成了良好的效果；但仍面临产业布局同质化、创新要素流动受限、战略体系管理机制不健全和行政区壁垒等约束。未来应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强化全局统筹、空间治理和区域利益协调，发挥多系战略叠加效应，推动我国各级区域协调、健康、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区域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空间治理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5-0065-13 **收稿日期**：2026-05-2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123出行交通圈的地理基础与效应研究”(42271187)。

作者简介：金凤君，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北京 100101)。

冯瑜满，女，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北京 100101)。

叶志聪，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101)。

一、引言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十五五”规划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呈现了从单项推进转向多项协同的实施进程，宗旨是提升区域政策的耦合效率和综合效能，推动各类空间单元的发展与治理，以及区域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健康发展。

区域发展战略是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调节区域关系、优化空间布局、促进要素配置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经济地理学界长期关注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扩散和联系，强调区域发展应在比较优势、空间相互作用和尺度治理之间取得平衡(金凤君等，2021；陆大道，2002)；主体功能区研究则进一步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适宜性和区域功能定位纳入国家空间治理框架(樊杰，2015)。这些理论与政策实践共同构成了理解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重要基础。

从发展进程看，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土开发与治理战略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缩

小区域差距、优化区域关系为主要目标；区域重大战略以重点区域为载体，承担引领国家发展、破解突出矛盾和培育增长极的功能；主体功能区战略强调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适宜性确定空间功能，为国土空间开发提供底线约束和功能指引；新型城镇化战略则以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为主要空间组织形态，推动人口、产业和公共服务在更合理的空间尺度上集聚和配置。上述四类区域战略（后文简称“四系战略”）之间既有分工，也有叠加；既有各自的政策逻辑，也存在共同的目标指向。所谓“叠加效应”，正是在这种多战略、多尺度、多功能互动中生成的综合效应。

当前，围绕区域发展战略及其叠加效应，学术界已形成一定研究基础。一是从区域发展战略演进和区域经济格局变化出发，强调区域战略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张可云，2026；孙久文等，2026；孙久文，2026）；二是从实证分析视角探讨区域发展战略叠加实施的效果（朱晓杰，2023；刘华军等，2026；王娟娟，2026）；三是从经济地理学角度阐释区域战略叠加的内在机制与效应提升路径（樊杰，2025；樊杰等，2026）。然而，战略叠加并不必然产生正向效应。若目标不一致、功能不清晰、政策不协调、责任不明确，多战略叠加也可能形成政策拥挤、资源错配、地方竞争、重复建设和治理成本上升等问题。因此，本文旨在评价区域发展战略实施成效的基础上，探讨叠加效应的实施策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定性政策评估（qualitative policy assessment）方法，基于文献分析与政策文本梳理构建区域发展战略叠加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公开统计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与趋势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呈现2000年以来我国区域发展的格局变化和趋势特征。本文的分析不追求对战略实施效果的精确因果识别，而是着眼于揭示多系战略叠加作用的逻辑路径、条件约束和优化方向，为“十五五”时期区域战略的系统集成提供分析基础和决策参考。因此，本文的结论主要是对理论预期、政策演进与历史趋势一致性的判断，而非对战略叠加因果效应的量化估计。

二、区域发展战略体系的演进过程

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并非在同一时期形成，而是在不同发展阶段针对区域发展主要矛盾和国家空间治理任务逐步演进形成的。从20世纪末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为主要目标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到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相继形成，再到新时代更加注重不同战略之间的协同衔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体系经历了由单一板块施策向多战略并行、再向系统集成转变的过程。这一演进过程既反映了我国区域发展主要矛盾的变化，也为理解当前不同战略在空间上的叠加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历史背景。

（一）四大板块战略主导阶段：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基本目标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我国区域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东中西部发展差距扩大、老工业基地增长动力不足、部分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和贫困地区发展能力不足。在这一背景下，国家相继提出并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即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现在叫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该战略具有鲜明的板块化分区施策特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持、生态工程和政策倾斜等方式，改善各大区的发展条件，提升发展能力，缓解区域差距持续扩大的压力。

这一阶段的战略安排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改变了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背景下区域政策相对不均衡的状况，使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逐渐成为国家战略关注的重点。另一方面，通过交通、能源、水利、生态保护等重大工程建设，改善了区域发展基础，为后续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物质条件和政策基础。上述阶段形成的四大板块发展框架构成了我国区域政策体系的重要空间基础，也成为后续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的重要起点。

（二）多系战略并行阶段：从区域均衡到重点区域引领

“十一五”时期开始，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进入多元化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相继提出并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时期的区域战略不再只是围绕东西差距、南北差距和四大板块展开，而是更加突出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点区域、关键问题和战略支点。区域重大战略既是区域发展政策，也

是国家在创新、开放、生态、安全和现代化治理等领域的空间指引。上述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体系。

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逐步成为区域治理的重要支柱。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把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类型，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陈东等，2024），并与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整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进一步强化了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传导。新型城镇化战略则强调以人为核心，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空间发展指向实现了精准落地。

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战略目标多元化和战略空间叠加，同一地区可能同时处于多个战略之中。例如，长三角既是区域重大战略承载区，也是优化开发和高质量城镇化的重要区域；成渝地区既承担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中的增长极功能，又是新型城镇化和内陆开放的重要支点；黄河流域既涉及流域生态保护，也涉及能源和粮食安全保障、老工业基地转型和城市群发展。战略的重合叠加为叠加效应的发挥提供了条件，也对政策协调、空间统筹和协同分工提出了更高要求。上述从并行到协同的战略演进，构成了本文理论框架的核心经验基础。四系战略的叠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各自发展到交叉互补的历史过程。

（三）战略统筹与系统集成阶段：从政策并行到协同

党的二十大以来，我国国土开发与治理的重点开始由单项战略推进转向多系列战略协同，由政策覆盖范围扩展转向战略实施政策统筹。从功能作用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区域差距调节和区域关系优化的作用，区域重大战略进一步强化重点区域的引领带动和国家战略任务承载作用，主体功能区战略则进一步强调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进行差异化管控的作用，城镇化战略进一步强调区域城镇化形态、功能和结构引领作用。四系战略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要素合理配置和提升区域发展协调性方面具有共同指向。

上述四系战略的协同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任务的变化密切相关。首先，国土开发已逐步从大规模空间扩张转向存量优化和质量提升。21世纪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建设用地扩张、基础设施延伸和产业空间重组是区域发展的重要空间过程。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综合交通网络完善以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未来发展须更加注重提高空间利用效率、优化城镇体系结构和增强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其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呈现出更加复杂的表现形式。除体现为经济总量和基础设施水平的差距外，还体现为创新能力、公共服务质量、人口吸纳能力、生态环境约束、产业分工水平和资源安全保障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单一战略难以独立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不同战略之间的衔接和配合，形成更加综合的政策作用。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对国土空间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高质量发展需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维护生态安全格局，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需要稳定农业空间和资源空间，共同富裕目标也要求完善区域利益协调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这些任务都具有明显的空间属性，必须依托系统的战略体系加以统筹。

因此，战略叠加与系统集成阶段的核心，并不是简单增加战略数量或扩大战略覆盖范围，而是推动不同战略从并行实施转向战略与政策协同。这要求各系战略的实施应更加重视目标导向的一致性、空间安排的适配性、政策工具的协调性和治理责任的可落实性。只有在区域协调、重点区域引领、主体功能约束以及新型城镇化推进之间形成稳定衔接，四系战略由“各自发力”向“系统集成”转变，战略叠加效应才能真正转化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的实际成效。

三、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理论框架与评价维度

区域战略叠加效应是指各系战略在实施推进过程中围绕整体战略目标相互协同、支撑、衔接、补充而产生的集聚组合效应和递阶提升效果。随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体系由单项推进向多战略协同转变，战略间的目标导向、功能定位和空间作用逐渐融合，并对国土开发、经济发展、区域协调、资源环境和空间联系等产生综合影响。因此，理解区域战略叠加效应，需要从其作用机制及发展成效两个

方面展开分析。

（一）战略叠加效应的内在机理

战略叠加的本质是不同战略在区域复杂地域系统中集成。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等多系战略共同作用于特定地域空间，通过政策协同、要素重组、空间优化和网络涌现形成综合增益，使区域发展能力和空间治理效能呈现超过单项战略实施效果之和的非线性增长特征。

首先，政策协同是战略叠加效应形成的前提。不同区域发展战略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和政策导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侧重优化区域关系，区域重大战略突出重点区域引领，主体功能区战略强调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人口、产业和公共服务合理集聚。虽然各系战略均服务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目标，但由于侧重点不同，共同作用时可能出现发展与保护、集聚与扩张、均衡与非均衡等目标竞争甚至冲突，需要构建更加协调的政策工具，将多重战略由此消彼长的分力转换为相互衔接的合力，为战略叠加效应的释放提供政策基础。

其次，要素重组是战略叠加效应形成的核心机制。区域发展在空间上体现为生产要素不断流动、集聚和扩散所形成的阶段性重组，而区域战略则通过引导要素流向和配置方式深刻影响这一过程。区域战略的共同实施能够促进资本、技术、人才、土地、数据等要素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优化配置，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同时，重大工程、创新平台和开放政策也可以在特定的战略叠加地区相互配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区域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和效率提升。

再次，空间优化是战略叠加效应的重要表征。区域战略具有鲜明的空间属性，其影响涉及东部、中部、西部等不同板块，以及城市群、都市圈、流域等不同空间尺度。因此，战略叠加不仅要促进人口和产业合理集聚，还需要推动不同功能空间在区域范围内、区域之间协调发展，打破行政空间等人文地理边界对国土空间合理开发与高效组织的约束。多重战略有助于推动区域空间组织方式由分散走向联系，由单中心集聚转向多中心协同，使区域功能分工更加合理，各地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最后，网络涌现是战略叠加效应持续强化的动力源。随着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新型基础设施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推进，区域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知识流联系日益密切，为战略叠加效应提供了新的条件。各系战略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创新的扩散范围、提升产业协作深度和公共服务共享水平，并形成新质生产力要素持续集聚、技术应用与创新成果不断转化、区域间联系互动日益加强的正反馈机制。

（二）战略叠加促进区域发展的分析框架

区域发展依托特定的地理和政策环境，涉及经济增长与协调、土地开发与保护、要素集聚与溢出等多维过程，各系区域战略在其中通过政策、要素、空间和网络等机制发挥叠加作用。基于此，本文从格局结构优化、发展水平提升、发展差距缩小、资源环境改善和跨区域协调五个维度构建区域发展成效的分析框架，它们分别反映了空间效率、增长动力、协调程度、可持续性和联动能力，构成评估战略叠加下区域发展成效的核心内容（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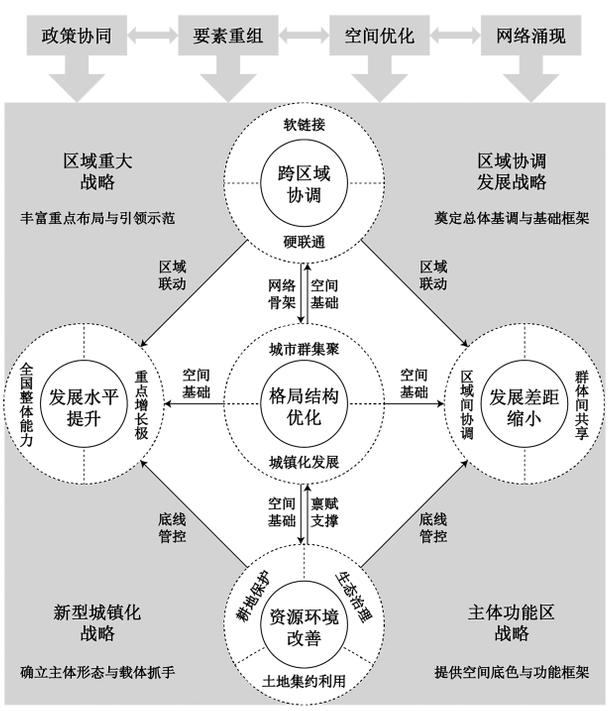


图1 战略叠加促进区域发展的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国土空间格局与结构的优化主要体现为城镇化发展与城市群集聚的相互促进，前者构成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后者则是当前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需求。随着我国城镇化进入存量提质阶段，区域发展的主要矛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诉求与空间供给结构不匹配的矛盾，原有粗放式开发导向面临重大挑

战(李红等,2025)。各系区域战略需要打破各自为政带来的低效率、蔓延式城镇化模式,通过形成叠加效应,引导要素向适宜地区合理集聚,提高经济社会活动对国土空间的利用效率。这种城镇化发展方式为以城市群为代表的经济高度紧密型空间组织形式提供了人口、产业和市场基础,并且促进了城市群内部不同等级城市间形成更合理的功能分工和空间联系。同时,城市群的发展也增强了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使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县城得到嵌入区域生产与创新网络的机会,推动人口与产业在更大尺度上优化配置。因此,战略叠加效应将促进城镇化发展与城市群集聚的循环累积过程,引导国土空间形成功能完善且运行高效的空间格局与结构。

区域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是全国整体发展能力增强与重点区域增长极培育相互支撑的结果。首先,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战略通过推动基础设施完善与比较优势发挥,在整体上缓解了发展失衡问题,提升了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战略支持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集聚创新、人才、资本和新兴产业,形成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产业创新策源地和对外开放门户。这些重点区域依托要素集聚优势与政策先行地位成为经济发展增长极,并通过产业转移、技术扩散和市场联系带动其腹地发展;反过来,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形成完整的产业配套与雄厚的经济基础,为重点区域持续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要素与市场。换句话说,战略叠加效应通过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统筹整体与重点的关系,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进一步地,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区域发展不仅是整体水平的提升,更反映为发展差距的缩小,即兼顾区域间协调和群体间共享。其中,区域间协调主要围绕经济"虹吸效应"愈发突出、价值链层级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强调战略叠加如何通过产业关联与创新合作,将重点区域的增长成果向周边扩散(陈雯等,2026);群体间共享则重点考察城乡居民收入、基本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等方面的差异,关注战略叠加能否为不同地区和群体提供公平且因地制宜的发展环境(张朝辉等,2026)。受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区域间、群体间存在客观差异,加之区域差距正由传统的经济差距延伸至创新环境、人口吸引力和公共服务品质等深层次差异,战略叠加的关键在于使各区域依据比较优势和主体功能形成适宜发展路径,并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逐步协调发展。

资源环境的改善主要体现在耕地保护、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提质增效上。对于耕地保护,多系战略共同实施可以通过划定开发边界和强化用途管制,避免新增建设用地无序占用耕地。对于土地利用效率提升,战略叠加有助于推动新增建设需求向跨区域联结型地区等各系战略的交汇地带集中,避免土地开发缺失重心,并通过产业空间的整合与再开发,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而对于生态环境治理,随着以流域为主体的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与主体功能区、新型城镇化等战略相互衔接,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流域和生态脆弱地区的保护力度将得到加强,跨行政区开发活动带来的生态割裂将显著减少,推动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等工作实现协同并进。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创新链产业链的高效协作分别构成跨区域协调的硬联通与软链接基础。不同区域战略往往对应不同尺度,其产生的叠加效应能推动交通、能源、水利和信息等基础设施由行政区内部布局转向跨区域统筹,减少网络断点和重复建设。同时,各系战略在产业上下游联系、创新平台合作等方面提供政策保障,可以进一步优化不同地区的功能分工,并通过跨区域产业合作、创新平台共建和成果转化,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之间的联系。因此,区域战略叠加作为硬联通与软链接的支撑,为跨区域要素流动提供基础设施条件,并将设施的联系转化为稳定的经济联系和制度协作,共同推动区域发展由行政区内部相对独立运行转向城市群、都市圈、流域和经济带等功能空间协同发展,提高区域网络的联系强度、资源配置效率和整体竞争力(王姣娥等,2026;张之幸等,2026)。

四、区域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成效

上文从政策协同、要素重组、空间优化和网络涌现等方面阐释了区域战略叠加影响区域发展的内在机理,并从格局结构优化、发展水平提升、发展差距缩小、资源环境改善和跨区域协调五个维度构建了分析框架。经过20多年持续推进,四系战略体系在实施过程中对我国国土空间优化、区域经济增

长、区域差距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和跨区域联系等方面产生了明显效果。这些成效并非单项战略孤立作用的结果，而是不同战略在空间上叠加、在政策上衔接、在功能上互补的综合结果。这些成效为“十五五”时期进一步发挥叠加效应奠定了基础。

（一）国土开发格局与结构持续优化

各系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深刻变化。21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人口和产业不断向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集聚，交通、能源、信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网络及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城市群逐渐成为承载人口、产业、创新和公共服务的主体空间形态，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持续增强（何继新等，2025）。这一过程不仅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更是国土空间组织方式从分散开发向集约开发、从行政分割向网络联系、从单点增长向多中心协同转变的过程。

从城镇化进程看，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城镇化率由36%左右提高到2025年的近70%，25年提高了30多个百分点，年均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城镇化率由45.74%提高到73.98%，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东北地区由52.05%提高到71.04%；中部地区由29.70%提高到63.70%；西部地区由28.65%提高到61.64%。但城市功能品质、人口吸纳能力、产业支撑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仍存在差异（姚士谋等，2025）。从重点区域看，粤港澳、长三角和京津冀已经进入高度城镇化阶段，城市群内部人口、产业和创新资源高度集聚，都市圈化和网络化功能日益增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黄河流域主要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正在成为支撑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从沿海与内陆对比看，沿海地区城镇化率长期高于内陆地区，但两者差距由2000年的约4个百分点收窄至2025年的约2.7个百分点，表明内陆地区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高铁、高速公路、机场、能源通道和数字基础设施向内陆延伸后，内陆城市与全国市场之间的时空距离明显缩短，人口和产业集聚能力有所增强。

更重要的是，我国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基本避免了大规模空间失序风险。虽然局部地区存在城市摊大饼、开发区低效利用、供需失衡和生态空间被挤压等问题，但总体上，主体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制度逐步建立，为国土空间开发提供了基本秩序。这说明区域战略已经从单纯促进开发增长，逐步转向塑造空间结构、优化空间秩序和维护空间安全。

（二）区域经济发展协同提升

各系战略的实施显著提升了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和重点区域发展能力。东部地区继续发挥开放、创新和高端产业集聚优势；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产业承接能力明显提升；东北地区转型初见成效，粮食安全、装备制造、能源资源和边境安全等战略地位稳固。总体看，区域发展战略体系在推动重点区域率先发展、促进中西部追赶和增强全国经济空间韧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地区生产总值看，2000—2025年，各大区域经济总量均实现数倍增长。以2000年不变价核算，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2025年的GDP相当于2000年的8.3倍、8.8倍、9.3倍和5.6倍（见表1）。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增长倍数更高，说明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基础设施补短板、产业转移承接和新型城镇化推进等战略作用下，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整体较快，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缓解。然而，东北地区增长幅度明显低于东中西部地区，反映出东北地区在产业结构转型、人口变化和体制机制转换方面仍面临较大压力，也预示“十五五”

表1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指数（2000年=100）

地区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东北	100	158	265	380	456	559
东部	100	176	311	475	640	827
中部	100	167	308	497	677	883
西部	100	168	313	521	715	927
京津冀	100	167	276	409	535	686
成渝	100	169	327	558	782	1028
粤港澳	100	185	335	506	681	834
长三角	100	179	323	496	676	888
黄河流域	100	172	308	488	656	853
长江经济带	100	173	318	508	699	918
北方	100	168	288	439	571	732
南方	100	174	320	506	694	899
内陆	100	167	306	496	673	871
沿海	100	174	307	467	624	804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资料整理，2025年为趋势外推法计算获得。

时期东北全面振兴仍需更强的战略叠加支持。

从重点战略区域看，成渝地区经济增长表现突出，2025年GDP相当于2000年的10.3倍，是所列重点区域中增幅最高的区域之一。长江经济带、长三角、黄河流域、粤港澳均实现了8倍以上增长，表明重点区域战略在增强区域增长动能、培育产业体系和提升空间组织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与治理能力加强（张华等，2025）。

区域重大战略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规模扩大，还体现在国家发展动力和空间组织方式的变化。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沿江地区从粗放开发转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区域功能重构和交通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制度协同、科技创新合作和统一市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规则衔接、国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高水平开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则正在成为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由此可见，区域战略已经不只是扩大区域经济总量的政策工具，更成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培育新增长极和推动制度创新的重要抓手。

（三）区域差距呈现阶段性收敛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战略体系的核心目标之一。从总体趋势看，区域战略并未消除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使区域发展格局呈现出阶段性收敛特征。2000—2025年我国主要区域之间的人均GDP相对差距总体呈收敛趋势。东部与中部的人均GDP比值由2000年的2.17下降至2025年的1.56，东部与西部的人均GDP比值由2000年的2.42下降至2025年的1.64（见图2）。这表明，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重大战略持续推进的共同作用下，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产业承接能力、城镇化水平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均有所提升，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相对差距得到一定缓解。然而，东部与东北的人均GDP比值却由2000年的1.37上升至2025年的1.87，表明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地区等转型仍然有待推进。

从城市群尺度看，差距持续演化。长三角与成渝地区间人均GDP比值总体下降，说明成渝地区作为国家重要增长极和西部高质量发展支撑区，其经济追赶能力有所增强。与此同时，长三角与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比值则呈现不同程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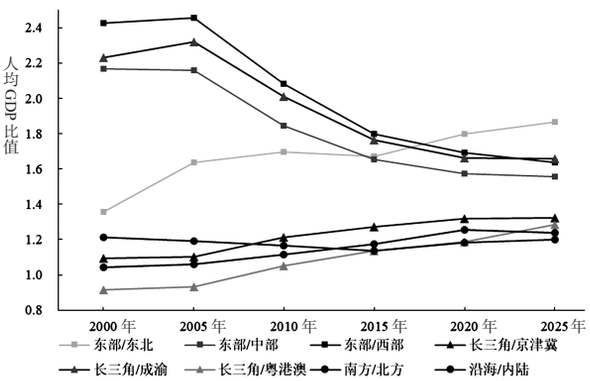


图2　2000—2025年典型区域人均GDP比值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资料整理，2025年为趋势外推法计算获得。

升，南方与北方的人均GDP比值也由2000年的约1.04上升至2025年的约1.24。这说明，随着区域竞争从要素投入和工业化扩张转向创新能力、产业组织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竞争，区域差距正在从东中西差距进一步转向城市群差距与南北差距。沿海与内陆比值整体变化相对平稳，但2020年以后收敛趋势有所放缓，也表明沿海地区在高端要素集聚发展等方面仍具有较强优势。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在较长时期内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2000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在较长时期内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0年的约2.79∶1下降至2025年的约2.31∶1，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呈收窄态势。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原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条件显著改善，乡村振兴战略继续推动县域经济、特色产业、农村电商、农产品加工和城乡融合发展。

但也要看到，区域差距并未根本消除，而是从传统的经济总量、基础设施差距，逐步转向发展能力、创新能力、人口吸引力和公共服务品质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国家中心城市和核心城市群仍然具有强大的资本、技术、人才和高端服务集聚能力；部分中西部地区虽然经济增速较快，但产业层级、创新平台、财政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仍相对不足；东北地区和部分资源型城市面临人口流出、产业转型不足和增长动力偏弱等问题（金凤君等，2026）。因此，当前区域协调发展已进入更深层次阶段，不能只看GDP增速是否收敛，还要看创新扩散是否充分、产业分工是否合理、公共服务是否均等、不同类型地区是否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空间冲突缓解

随着主体功能区战略、生态文明建设、国土空间规划和流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我国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空间治理能力明显增强，区域发展逐步从高强度开发转向有约束开发和高效率开发，耕地保护、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积极成效。

耕地保护方面，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和粮食安全责任制不断强化，耕地保护红线得到较好维护。2022年以来，全国耕地面积总体稳定在19亿亩以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保持在15亿亩以上，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0.65万亿公斤以上。粮食安全基础的稳定，说明区域发展战略并未单纯追求城市化和工业化扩张，而是在主体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和耕地保护制度共同作用下，维护了农业空间和粮食生产能力，这对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基础性意义。

土地利用方面，建设用地节约集约水平持续提升。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逐步建立，城镇开发边界、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三条控制线不断强化，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受到更严格约束，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低效工业用地整治、城市更新和开发区整合成为提高空间效率的重要途径。2010年以来我国单位GDP建设用地使用面积持续下降，2025年较2010年累计下降超过40%。这一变化表明，经济增长对土地扩张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国土空间开发正在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和效率提升（肖金成，2024）。

生态环境方面，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体系和生态保护红线逐步建立，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生态治理力度不断加大。全国森林覆盖率由2000年的16.55%提高到2025年的24%左右，森林蓄积量持续增加。空气质量和水环境质量也总体改善，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浓度较“十二五”时期明显下降，长江干流水质近年来总体保持较好水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国家重大战略。上述变化说明，区域战略的功能已经从促进开发拓展为规范开发、优化开发和治理开发。

（五）跨区域联系和一体化水平持续提高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要素流动增强，是区域战略叠加成效的重要体现。交通运输部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16.5万千米，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超5万千米；全国高速公路里程19.1万千米，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显著压缩了区域之间的时间距离，提升了城市群和都市圈内部的通勤联系、产业协作和公共服务共享能力。2000—2025年我国主要战略区域货运量总体持续增长（见图3）。其中，长三角地区货运量由25.23亿吨增加到134.50亿吨，增幅最为明显；京津冀由13.23亿吨增加到36.97亿吨；粤港澳由8.46亿吨增加到37.29亿吨；成渝地区由7.82亿吨增加到34.52亿吨。货运规模扩张说明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区域间要素流动、产业协作和市场联通程度持续提高，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正在推动我国空间联系由相对分散走向更加网络化和一体化。

从空间组织看，长三角地区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城市为核心正在形成多中心网络结构，交通一体化、产业链协作和制度协同不断推进；京津冀地区通过轨道交通、生态治理和公共服务合作推动功能重构；粤港澳大湾区通过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深中通道等重大基础设施强化跨境和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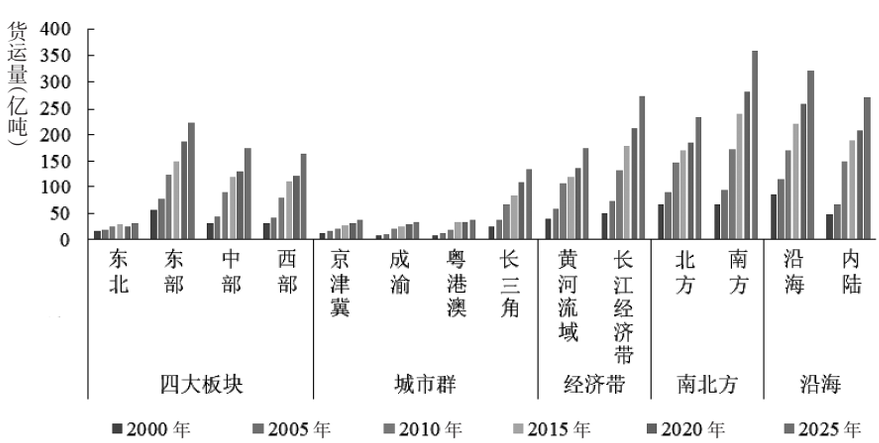


图3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和2025年典型区域货运量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资料整理，2025年为趋势外推法计算获得，不构成对政策实施效果的精确度量。

珠江口联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通过双核联动、产业协作和交通互联提升整体竞争力。

从产业协作看，东部地区部分制造环节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建设先进制造基地和发展特色产业方面取得进展。长三角地区探索跨省产业园区、异地合作园区和生态补偿机制，推动上海的总部、研发和服务功能与苏浙皖制造配套能力形成互补；粤港澳大湾区推进规则衔接、跨境基础设施和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强化香港、澳门与珠三角城市在金融、科技、制造和专业服务方面的分工合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推动成都、重庆双核联动，并通过产业园区共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和公共服务协同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

五、未来各系战略叠加施策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区域发展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从“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看，仍面临不少深层次问题。当前问题主要集中在区域竞争与资源错配、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受限、战略体系管理机制不健全和体制机制障碍等方面。

（一）区域竞争与资源错配

区域战略叠加的基本目的是通过不同战略的协同实施，推动不同区域依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和主体功能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但在实践中，地方政府既承担落实国家战略的责任，也面临稳定增长、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和提升财政收入等现实压力。例如，面对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转型压力较大、部分区域发展动能转换滞后的客观现实，地方政府借助战略平台破局求变、争取资源的动机更为迫切。部分地方在落实区域战略时，更加重视通过战略平台争取重大项目、政策支持、财政资金和建设指标，而对自身在国家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功能定位、与周边地区的分工关系以及长期发展能力建设重视不足。由此，各系战略叠加在部分地区并未充分转化为区域协同，反而表现出产业布局趋同、项目重复建设和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

产业发展同质化是区域竞争和资源错配的重要表现。随着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断推进，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算力中心和数字经济等产业频繁出现在地方产业规划和招商目录中。这些产业具有较强增长潜力，地方积极布局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部分地区对本地产业基础、创新能力、人才供给、能源条件、环境容量和市场需求评估不足，更多依据政策热点和招商竞争选择产业方向，导致产业规划相似、园区定位趋同和招商对象重复。尤其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内部，存在同类产业、同类平台和同类基金竞争过度等现象。同时，重复建设和阶段性产能过剩风险也值得重视。

因此，区域竞争与资源错配的根源，在于地方发展激励与国家整体战略目标之间仍存在偏差，行政区经济运行逻辑与功能区治理要求尚未充分衔接。未来应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框架下，加强战略协同，完善重大生产力布局、产业准入、产能监测和区域协同机制，引导地方政府更加重视主体功能、比较优势和区域分工，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

（二）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受限

从现实看，我国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水平不断提升，但仍受到多重制度型壁垒制约。首先，科技资源配置仍具有较强的行政属性。重大科研平台、重点实验室、高校院所、科技计划项目和财政科研资金在空间上高度集中，且在管理体制上往往依托特定行政层级和主管部门运行。东部沿海地区和核心城市群对资本、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展现出强劲的集聚效应，但这种要素集聚并未顺畅转化为对中西部及后发地区的辐射带动，区域差距正在从传统的经济总量差距转向深层次的创新能力与发展能力差距。不同地区之间科研项目、平台资源和财政资金的共享机制仍不完善，跨区域联合攻关、成果共享和收益分配机制不够健全。部分创新平台虽然名义上具有区域服务功能，但在实际运行中仍主要服务于所在城市或所在单位，难以真正成为跨区域创新网络的公共节点。其次，技术、数据和知识产权等新型要素市场发育仍不充分，影响创新资源在区域间的有效配置。技术成果转化涉及高校院所、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和中介服务组织等多类主体，但当前跨区域技术交易、知识产权评估、成果定价、收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仍不健全。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确权、定价、流通、交易和安全监管规则仍在完善过程中，不同地区之间数据开放标准、平台接口、监管要求和

应用场景存在差异，也会影响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跨区域协同发展。创新要素市场不完善，使创新资源难以按照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实际需求自由组合，削弱了统一大市场对区域创新体系的支撑作用。最后，人才流动和创新服务体系仍存在隐性壁垒。涉及住房、教育、医疗、社保、职称评价、科研项目申报、人才计划认定和公共服务等一系列制度安排。

（三）战略体系管理机制不健全

战略叠加效应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各系战略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更取决于能否形成统一高效的战略体系管理机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分别形成于不同发展阶段，政策目标、实施主体、空间尺度和管理部门存在差异。如果缺乏统一的统筹机制和清晰的责任体系，多系战略在实践中就容易表现为各有依据、各自推进，难以形成真正的系统合力。当前一些地区在落实国家区域战略时，仍然存在分别理解、分别部署、分别考核的问题，战略之间的内在联系没有被充分打通。

从部门协同看，战略叠加涉及发展改革、自然资源、财政、科技、工业和信息化、生态环境、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不同部门往往围绕自身职责制定专项规划和政策工具，在产业布局、土地利用、生态管控、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平台配置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形成各自的政策体系。由于部门政策的目标导向、资源配置方式和考核重点并不完全一致，实践中容易出现政策之间衔接不足甚至相互掣肘的情况。例如，产业政策鼓励布局重大项目，但国土空间规划、能耗指标和生态环境准入有时存在不能同步匹配现象；新型城镇化要求增强城市群和都市圈承载能力，但财政、住房、交通和公共服务政策协同不足；主体功能区强调差异化空间管控，但产业扶持和区域发展政策仍可能沿用相对统一的增长逻辑。这些问题都会削弱战略叠加效应。

从央地传导看，国家层面的战略目标在地方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层层转化和局部化倾向。中央提出区域战略叠加，强调的是全国一盘棋和不同区域之间的功能互补，但地方政府在具体落实时，往往更关注本地区可争取的项目、平台、资金和政策试点。有些地方将国家战略简单项目化、工程化，把是否纳入重大工程、是否获得专项资金、是否新增产业平台作为战略落实的主要标志，而对区域分工、跨界协同、功能约束和长期治理重视不足。国家战略在向地方传导过程中存在目标收缩和方向偏移等问题，原本面向整体协同的战略安排，被转化为地方增长竞争的政策资源。

（四）体制机制存在障碍

区域战略的实施空间往往跨越行政边界，但我国许多政策工具和治理责任仍以行政区为基本单元。财政收入、土地指标、能耗指标、环境责任、公共服务供给和干部考核大多按行政区划分，这使跨区域合作面临现实障碍。产业转移涉及税收分成，生态保护涉及补偿机制，公共服务共享涉及财政负担，交通一体化涉及投资责任，这些都需要跨行政区利益协调。虽然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显著促进了跨区域联系与网络化演化，但局部地区仍面临低效开发与空间秩序优化的压力，这反映出要素跨界集聚和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趋势与传统行政区划分割治理体制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行政区壁垒还影响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流动。虽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在推进，但地方保护、市场准入隐性门槛、公共服务不均等、户籍制度约束和数据流通规则不完善等问题仍然存在。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战略叠加效应就难以充分释放。

区域发展涉及多个部门、多个层级和多个规划体系。现实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和地方发展规划之间仍可能存在衔接不足。有的规划强调产业发展，有的规划强调生态保护，有的规划强调城镇建设，有的规划强调基础设施投资，如果缺乏统一协调，就可能出现目标冲突和空间冲突。政策协同不足还表现在政策工具之间缺乏组合。比如，产业政策鼓励某类产业发展，但土地、能源、环境容量和人才政策未能同步配套；生态保护政策强调限制开发，但财政补偿、绿色产业和公共服务支持不足；城镇化政策推动人口集聚，但住房、教育、医疗和公共交通供给跟不上。这些都可能影响战略实施效果。

六、“十五五”时期深化协同实施各系战略的政策建议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也是区域发展战略体系从完善布局转向提升效能的重要阶段。发挥战略叠加效应，应重点从战略体系、空间治理、要素配置、区域分工和制度机制等方面发力，推动格局结构优化、发展水平提升、发展差距缩小、资源环境改善和跨区域协调相互促进。

（一）体系化区域战略，发挥战略叠加效应

战略实施在发展水平提升和部分区域差距缩小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不同地区之间仍存在显著分化：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成渝等重点区域增长动能较强，而东北地区增长幅度明显低于东中西部地区；与此同时，南北方人均GDP差距有所扩大。这表明，同一套战略体系在不同类型区域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存在差异，战略叠加并不意味着政策工具简单累加即可产生相同效果。因此，应从体系化角度进一步明确各战略的功能定位和适用边界。

首先，应进一步明确四系战略在国家区域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应继续发挥总纲作用，统筹东中西东北、南北方、沿海内陆、城市乡村等多重区域关系；区域重大战略应突出国家级重点区域的引领、示范和突破功能；主体功能区战略应强化底线约束和功能管控，维护国土空间安全、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新型城镇化战略应以城市群、都市圈和县域为载体，推动人口和经济活动合理布局。只有明确不同战略的功能边界，才能避免多重目标在同一空间内无序叠加，促进不同战略由功能分立走向目标协同。

其次，应推动不同战略间形成稳定衔接机制。对于同一地区，应明确其在不同战略中的主导功能。例如，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既要发展产业，也要承担流域生态保护责任；黄河流域能源基地既要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也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粤港澳大湾区既要强化国际创新和开放功能，也要处理好跨境治理和区域协调问题。战略叠加效应的关键是形成有主有次、相互支撑的目标体系，避免发展引导、空间管控和生态约束之间相互冲突。

最后，应强化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区域战略涉及多部门、多地区和多层级，必须通过更高层级的协调机制解决地方难以解决的跨区域问题。特别是在重大生产力布局、国家实验室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能源通道、生态补偿、跨区域交通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方面，应加强国家层面的统筹设计。同时，应围绕格局结构、发展水平与发展差距、资源环境、跨区域协调等内容建立区域战略成效的动态评估机制，及时识别战略实施中的目标偏离、政策冲突和空间错配，并据此调整政策工具和实施重点。

综上所述，应将系统集成作为未来区域战略优化的重要方向。建立跨战略、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实施机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在目标制定、规划衔接、政策实施、绩效评价等方面形成闭环管理，促进战略之间由“政策叠加”向“系统集成”升级，真正形成整体谋划、协同推进、综合施策的区域治理新格局，充分释放多战略协同实施的综合效能。

（二）优化空间治理尺度，推动行政空间与功能空间耦合

当前，城市群、都市圈和经济带已经成为承载人口、产业和创新要素的重要空间载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推动区域联系由行政区内部运行逐步转向网络化联系。但现有治理仍较多依赖于行政区划，与人口流动、产业联系和生态过程所形成的功能空间存在一定错位。因此，进一步释放战略叠加效应需要建立与区域功能联系相适应的多尺度空间治理体系。

战略叠加效应的释放，需要建立多尺度空间治理体系。国家层面应把握总体格局，明确区域战略方向、主体功能定位和国土空间底线；区域层面应强化城市群、都市圈、流域和经济带等功能空间的统筹治理；地方层面应根据自身条件落实差异化发展任务。经济地理学强调，区域并非固定不变的物理空间和行政容器，而是要素流动、产业联系、生态过程和制度安排共同构成的地域系统（陈品宇等，2019）。行政空间与功能空间不完全一致，是当前区域治理中许多问题的来源。应以空间优化为重要抓手，推动战略实施尺度与人口流动、产业联系、生态过程和公共服务范围相适应，提升国土空间格局与区域功能组织的匹配程度。

城市群和都市圈是“十五五”时期发挥战略叠加效应的重要空间尺度。城市群具有产业、创新、交通和公共服务网络化特征，适合承担国家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主要功能；都市圈则更接近居民日常通勤、就业、住房和公共服务空间，是推进一体化治理的现实尺度。应加快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公

共服务共享、产业协作和生态共治，推动中心城市从单中心集聚转向网络化带动；强化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防止要素过度向少数核心城市集中，促进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协调发挥。

县域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空间尺度。新型城镇化不能只关注大城市和城市群，还要重视县城和中心镇在城乡联系中的作用。对于中西部、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而言，县域是承载公共服务、特色产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发挥战略叠加效应，应推动城市群、都市圈、县域和乡村之间形成分工合理、联系紧密的空间体系，分类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支撑体系，推动城镇化发展、城市群集聚与城乡协调相互促进。

（三）统筹新质生产力培育与空间布局

各系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水平总体提升，但不同地区在创新能力、产业层级和发展动力方面的差距仍然存在，东北地区增长动能不足、部分中西部地区创新平台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表明未来区域协调发展不能依赖传统要素投入，而需要通过创新扩散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十五五”时期，培育新质生产力将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新质生产力具有明显空间选择性，往往依赖高水平创新平台、高素质人才和现代基础设施等（金凤君等，2024）。因此，其布局既不能平均分散，也不能过度集中于少数超大城市，而应在国家区域战略体系下实现有序集聚和梯度扩散，在提升重点区域创新策源能力的同时，增强创新成果向其他地区扩散转化的能力。

应支持创新基础较好的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建设科技创新策源地，强化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水平大学、创新型企业和资本市场的协同。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地区应继续发挥原始创新、产业引领和国际合作功能。同时，应推动创新成果和产业链环节向中西部、东北和其他具备条件的地区扩散，支持成渝、长江中游、关中平原、辽中南、中原等城市群培育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此外，要进一步完善创新成果跨区域转移转化、产业协作和利益分享机制，使重点区域的创新优势更有效地转化为更大范围的发展动力，促进整体发展水平提升与区域差距缩小。与此同时，各地应当避免简单追逐同一产业热点，而忽视产业链分工、能源资源条件、环境容量和市场需求。

主体功能区战略应为新质生产力布局提供约束和引导。对于生态功能区，应重点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绿色能源、文旅康养和数字化公共服务；对于农产品主产区，应推动农业科技、智慧农业、农产品加工和冷链物流；对于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地区，应重点推进产业更新、绿色转型和存量空间再利用。通过这种差异化布局，新质生产力培育才能与国土空间安全、生态安全和区域协调发展更好衔接。

（四）以试点探索、经验模式推广促进叠加效应释放

战略叠加在不同区域呈现出明显差异，既有成渝、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增长动能增强，也有东北地区增长相对乏力、部分地区产业趋同和区域协同不足等问题。这说明战略叠加效应具有较强的地域条件依赖，不同战略组合需要与区域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功能定位相匹配。因此，区域战略叠加效应具有复杂性，不可能通过统一模式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应坚持试点先行、分类推进和经验推广。可以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开展试点，例如跨省都市圈一体化治理试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产业转移利益分享试点、主体功能区差异化考核试点、数据要素跨区域流通试点等。不同类型试点应聚焦政策协同、要素重组、空间优化和网络联动中的突出问题，检验不同战略组合在特定地域空间中的适用条件和实际成效。试点地区还应兼顾东部发达城市群、中西部成长型城市群、资源型地区、生态功能区和边境地区等不同区域，以便形成更具适用性的政策经验。

试点应注重可复制、可推广、可评估，形成具体制度安排、操作流程和评价标准。对于成熟经验，应通过国家规划、政策文件和标准规范向更大范围推广；对于效果不明显或成本过高的做法，也应及时调整。跨区域合作尤其需要稳定的利益分享机制，在产业转移、共建园区、生态补偿、公共服务共享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中明确成本分担、收益分配和责任追究规则。此外，应进一步完善跨区域协商、利益补偿和争议解决机制，将基础设施联通转化为产业链创新链和公共服务的链接，推动区域联系由短期项目合作走向长期制度协同。

参考文献

[1]金凤君，马丽.面向信息技术发展的经济地理学创新体

系建设[J].经济地理,2021,41(10):16-23.
[2]陆大道.关于"点-轴"空间结构系统的形成机理分析[J].地理科学,2002(1):1-6.
[3]樊杰.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J].地理学报,2015,70(2):186-201.
[4]张可云."十五五"时期的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学习领会"十五五"规划建议[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1):1-6.
[5]孙久文,董红燕.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理论阐述与机制探索[J].经济体制改革,2026(1):3-14.
[6]孙久文.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J].社会科学,2026(1):10-16.
[7]朱晓杰.国家战略叠加下区域发展的空间关联及影响因素[J].区域经济评论,2023(2):120-127.
[8]刘华军,张昊天.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叠加效应研究[J].财经研究,2026,52(1):4-18.
[9]王娟娟.区域重大战略的叠加效应:基于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的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26(5):64-73.
[10]樊杰."十四五""十五五"时期的区域协调发展及其经济地理学定律[J].经济地理,2025,45(1):1-7.
[11]樊杰,李淦.区域战略叠加的经济地理机制及效应最大化途径[J].经济地理,2026,46(1):1-12.
[12]陈东,刘宝印,樊杰,等.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评估与前景展望[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4,39(4):620-628.
[13]李红,蓝水英,李静怡,等.中国城市群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与区域差异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5(1):91-103.
[14]陈雯,吴加伟,孙伟,等.新时期人文—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空间规划的联动创新[J].地理科学,2026,46(3):491-505.
[15]张朝辉,王业强,罗杨帆.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的时空差距与内源贡献[J].地理学报,2026,81(2):363-386.
[16]王姣娥,何宛芩,黄洁,等.中国城乡交通融合的理论内涵与空间格局[J].地理学报,2026,81(4):966-985.
[17]张之幸,金凤君,陈卓,等.交通基础设施对中美国土空间优势的塑造与模式研究[J].地理学报,2026,81(6):1866-1887.
[18]何继新,高文静.区域新型基础设施发展能力联动效应与提升路径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5(6):67-79.
[19]姚士谋,管驰明,叶昌东,等.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型城镇化的若干问题的思考[J].经济地理,2025,45(6):1-10.
[20]张华,李鑫.中国四大城市群人口就业增长与结构的时空格局[J].地理学报,2025,80(6):1502-1519.
[21]金凤君,王姣娥,马丽,等.国土空间开发与治理战略体系叠加效应的机制与愿景[J].资源科学,2026,48(4):757-767.
[22]肖金成,洪晗,李军.主体功能区战略与促进国土经济高质量发展[J].开发研究,2024(3):1-9.
[23]陈品宇,李鲁奇,孔翔.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区域:研究综述与启示[J].人文地理,2019,34(6):10-16+61.
[24]金凤君,叶志聪,陈卓,等.新时期我国新质生产力的源—汇功能甄别与空间布局[J].经济地理,2024,44(8):8-16.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Superposition Effects

Jin Fengjun　Feng Yuman　Ye Zhicong

Abstract: Leveraging the superposition effects of th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major regional strategies, the major functional zone strategy, and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optimiz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and territorial spatial governance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is study first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these four strategic systems, theoretically examin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ir superposition effects, and develop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how strategic superposition promotes regional development. It then evaluates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generat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ional strategic system and explores pathways for optimizing strategic superposi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strategies has promote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coordinated growth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hased convergence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the mitigation of spatial conflicts betwee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interregional linkages, thereby generating positive overall effects. However, several constraints remain, including the homogenization of industrial layouts, restricted flows of innovation factors, incomplete management mechanisms for the strategic system, and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between regions.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take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the overarching goal, strengthen overall coordination, spatial governance, and regional interest coordination, and further leverage the superposition effects of multiple strategic systems to promote coordinated, health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cross regions at all levels.

Key Word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Major Functional Zones; New-Type Urbanization; Superposition Effects of Strategic System; Spati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敬　研）